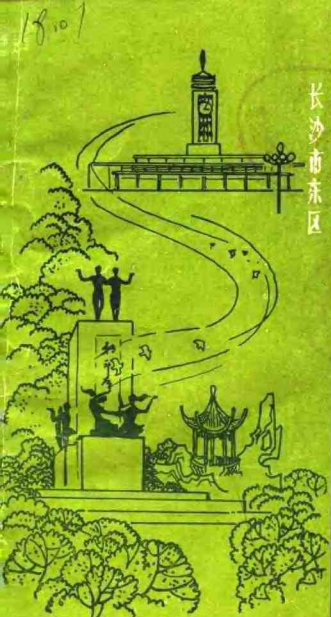




长沙市东区

文史资料

89

第3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东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黎明前的陈公馆.....	黄时美 (1)
喜迎长沙和平解放.....	丁湘庭 (12)
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与鲁班庙.....	东 平 (17)
先烈血染识字岭.....	王亚元 (27)
记牺牲在东区的红军将领陈毅安.....	朱运鸿 (30)
《我的一家》与修业小学.....	陈光剑 (34)
建国初期长沙市工商业纳税情况.....	彭瑞强 (36)
三友实业社与中国内衣公司创业记... 彭 科 (43)	
长沙市第一家制药厂在东区起家.....	丁湘庭 (46)
名噪一时的福星机器染厂	童秉荣 (49)
昭信会计师事务所始末	秉 荣 (51)
曹典球先生和工商界渊源.....	渔 父 (54)
爱国实业家章克恭先生 事略	黄 政 (57)
一位海外赤子的无私奉献.....	王年松 (62)
我所了解的唐生智将军.....	黄曾甫 (65)
焦达峰都督与福和旅社.....	万天石 (70)

古城卫士天心阁	王 杰 (72)
“地下明珠”的诞生与发展	王年松 (77)
起步于东区的体操名星	陈光剑 (82)
“喇叭司令”李惠迪	江 华 (87)
我区及我市图书业公私合营经过	戴武陵 (90)
从东区出土文物看灿烂的楚文明	何 强 (93)
解放前后我区的影剧业	巴 陵 (97)
《追鱼记》曲直谈	陈北方 (102)
国耻纪念亭回顾	黄政若 (106)
张治中怒杀“周神仙”	万天石 (108)
发生在鱼米之乡的一次抢米风潮	郑克成 (112)
航空处长丧命内幕	万天石 (114)
“佛爷升天”的闹剧	寅 初 (117)
旧社会东区的娼妓活动	郑克成 (119)
东区古街名考证	殷觉高 事 志 (122)
订正与补遗	黄曾甫 (127)

黎明前的陈公馆

黄时美

长沙和平解放前，受地下党组织的委派，我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来到我省著名实业家、湖南商会理事长陈芸田先生的家里从事革命工作。下面记述的，便是我在“陈公馆”的一些活动情况。

一九四八年我在长沙省立一中高中读书，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游行和助学运动。七月参加了地下党。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学联一中分会，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中间群众，打击反动势力，推动了学运的发展。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主力部队已被基本歼灭，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一九四九年四月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传说白崇禧二十多万军队即将败退湖南。湖南地下党省工委估计国民党反动势力将作垂死挣扎，加紧镇压人民，决定转移一些已经暴露或为政特注意的地下党员。四月份地下党

组织通知我撤出学校，先住在湘潭郭起寿同学家，不久转至长沙地下党员张经武家，张的父亲张铭西是商界有名的资本家，张经武当时联系湖大、一中等校学运工作，家中常有地下党员出入和居住。我和朱韵华同志（一中党支部书记，我是支委）当时都住在张家。十多天后，地下市工委书记沈立人来张家找我们谈话，我们对党的关怀爱护很感激，提出希望去解放区。沈立人同志向我们讲述了长沙即将解放的形势，说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求我们留下参加斗争。我们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分配的新任务。

座落在长沙天心阁城楼下古稻田29号的陈公馆，其主人陈芸田先生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商业立法委员，湖南商会理事长，是国民党政府，特别是工商界颇具影响的人物。他从大革命时起就与我党同志有联系，解放前他设在湘乡、上海、邵阳等地寓所均有我党同志秘密寄居和活动。在异常复杂、艰难的时刻，始终不渝，是与我党长期合作，久经考验的老朋友。解放前夕，颜惠庆、章士钊等名流去石家庄晋见毛主席，全国工商联会要陈芸田先生作代表随他们去石家庄，陈也想去，但经刘寿祺同志请示周里同志，认为湖南和平解放需要陈留下来做些实际工作，于是陈放弃了代表工商界第一个进入解放区参加全国政治活动的机会，决心留在湖南配合党

开展工作。由于陈先生早年与共产党员熊绍安有联系，经熊介绍，一九四八年陈先生与周里同志（化名唐先生）在陈公馆见了面。开始由熊联系，熊请陈芸田先生掩护地下党的活动，保护来往地下党员的安全。陈积极参加湖南和平解放运动，从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程潜起义；动员工商界拥护湖南和平解放，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稳定市场，迎接解放。熊调走后，由刘寿祺同志接替他与陈联系。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的一天，刘寿祺来对我说：“党组织决定将你从市里调到省工委工作，（他后来告诉我是周里同志将我的关系交给他的）你以陈的亲戚和家庭教师名义住在陈芸田先生家，主要是接收新华广播电台新闻和做宣持工作。”刘寿祺同志当时化名柳奇。他按原来约走的暗号，左手挟着一件淡黄色雨衣，带我到陈公馆，问陈芸田先生说：“贵公馆要请一位家庭女教师吧？”陈说：“是的，欢迎。”这样我便安排在陈公馆住下来，对外称是陈芸田妻于黄友华的侄女和家庭教师。刘寿祺同志交待我利用陈家的一台美国收音机收听解放区广播，记录下来供省工委领导参阅。其次是翻印党的各项政策和宣传品秘密教发，通过各种关系将党的声音传播到各界上展人士和群众中去，为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做思想和舆论准备。

陈公馆是一座普通的平房，房间并不多，陈设也不算豪华。我住在大门旁右侧的小厢房内，因大门很少打开，人们来往进出多走后门，所以我住的房子还算安静。白天陈家孩子们都上学去了，我便开始收听记录北平新华社广播电台的新闻，重要新闻都是用记录速度播出，但常常干扰很大，要费很大的劲才听得清，有时还听不清楚。我主要记录解放战场的胜利进展情况和党的各项政策，记录下来的材料交给刘寿祺同志转省工委参阅，有时刘寿祺同志因事未来，我就将记录材料送到北门麻园岭刘家交刘寿祺同志或他爱人陶蒲生同志。因为我当时已转入地下，公开露面要十分谨慎，一次送材料在路上被一中特务学生发现，我马上转进小巷，跑过几条街才将他甩掉。以后我出去送材料便乘人力车，不管天晴下雨都将前面的遮布挂上，这样才免被盯梢。

平、津解放后，华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几个孤立据点，如大原、大同等，四至五月都先后被我军解放，我百万雄师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解放战场捷报频传，国民党垮台指日可待。为了争取湖南和平解放，省工委把工作重点放在统战方面，派余志宏同志直接与程潜、陈明仁重要人物接触，刘寿祺同志也负责开展统战策反工作，他们多方收集情报，综合研究，提出意见供省工委参考。我记录的新华社广播消息，使他们及时地掌握解

放战场进展大好形势和党的声音，向国民党上层人物程潜等进行宣传，接受和平起义，走光明道路，使古城人民免遭劫难，多少起了一定作用。

我记录的新华社广播新闻除了送省工委领导参阅外，根据刘寿祺同志意见，还选择了一些重要内容，油印出来秘密散发。当时由于国民党报纸的反动宣传，钱江潮《武汉归来》的恶毒诬蔑，“南北朝”议论甚嚣尘上，湖南社会上层人士和有些群众对共产党心存恐惧和疑虑，我将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上海等地后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新闻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解放军布告》中约法八章特别是第一条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第二条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业照常营业的有关政策整理出来，利用省商会的油印机油印成传单，根据陈芸田先生提出的工商界几十个上层人士名单，用地下党名义发出信函，附上传单秘密寄给他们。当时工商界惶恐不安，思想混乱，有的携资逃往港澳，有的分散财产，改牌换记，有的四处打听，徘徊观望，他们收到地下党的信后，又惊又喜，纷纷到陈芸田先生处问情况，陈配合我们做工作，要使他们保产护厂，不逃跑，不疏散货物资产，不停业，不要听信谣言，工商界许多人士逐步消除了顾虑，安定了人心，也稳定了市场，后来逃往香港的少数大户

陆续回长，如长沙市工商会的常务理事郑增荣就是解放前夕回来的。

我在陈公馆油印的这些传单材料，除了从邮局寄出一部分外，还通过一些可靠关系秘密散发，如我在湖大念书的姐姐黄钧宪、黄熙年（地下党员）、周南女中读书的妹妹黄代明（地下外围）和在福湘女中教书的姐姐黄志连，都为我隐藏和散发过秘密传单，当时我已离家，她们并不知道我的住处，但都乐意支持党的秘密工作。此外，通过陈芸田先生安排在省商会工作的李俊彬同志（地下党员）也油印和散发过一些传单和信件。陈芸田先生的大女儿陈倩林（陈前妻之女）与我年龄相仿，她常到我房里来玩，透露出思想苦闷，感到前途渺茫，我就讲了一些革命道理给她听，使她了解到世界上有好多人为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她思想纯朴，很快成了我的好朋友和助手，有时我让她一起和我收听解放区广播，有一次收听到了上海人民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城的欢呼声，接着又听到了解放军在上海一个屋子缸里发现藏的很多光洋全部交公的新闻，她很有感触，说解放军真是好人。以后她经常为我寄发传单、材料，后来我介绍她认识了一些地下党团员，参加团组织的活动，解放后她到团校第一期学习，走上了革命道路。

白崇禧来长沙后，迫害与反迫害斗争十分激烈。桂

系军队到处严密布防，并派大批宪兵特务跟踪学生和进步人士，六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高继青被特务暗杀惨案，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沙。陈公馆对门不远住的是长沙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长毛健均。特务出入频繁，长沙警备司令部的秘密监狱就在陈公馆右边，常可听见处决犯人的批声，形势十分严峻，空气也很紧张。陈芸田先生充分利用他的合法身份掩护我们的秘密工作。当时国民党规定：凡立法委员和其家宅未经立法院同意，任何军警不得进入搜查和对其逮捕。陈公馆大门贴有盖上湖南警备司令部大印的布告“立法委员住宅不得滋扰”。陈是省商会理事长，有钱有势，不为特务注意。这样陈公馆便成了地下党设在敌人虎穴的一个秘密据点。周里同志多次约人来陈公馆，在我住的房里搜头交谈。常杏云、余志宏等同志都去过。他们秘密搜头或开会时，我和陈芸田的妻子黄友华及女儿陈倩林就放在外放哨，为了很好地掩护这个秘密据点，周里同志通过刘寿祺同志，叮嘱陈先生避免家中闲杂人员来往，一般工商事务也到省商会接洽。陈先生还借保安队番号和装务自费雇佣了十个士兵，驻在附近的修业小学里，每日在陈家附近巡逻放哨。陈家大门安了个猫眼，并在后院准备了三道暗门，以防不测。但敌人是十分狡猾的。有一次陈家大门左侧厢房被国民党一个团长和太太占住了，常有他们的卫兵出入，

我的收音工作必须仍旧进行，工作时就让陈情林等在外监视。陈先生经过交涉，迫使他们迁了出去。陈先生冒着极大的风险掩护我党的地下活动，保护了很多地下党员，除我在陈芸田身边工作外，还有派到陈的工厂中州棉织厂去搞工运的任凌池同志，安排在省商会的李俊彬同志，住在附近一商人家的赵光白同志。这些人都得到了陈光生的周密安排和精心掩护。另外，陈芸田先生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较多，他利用池的特殊地位和关系了解到很多内部情报，通过刘寿祺同志转告周里。白崇禧要调兵进攻宁乡姜亚勋游击队，陈先生将这个情报告诉地下党后，姜部立即分散化险为夷。在策动湖南和平起义的过程中，陈明仁复电宋希濂准备随程潜起义，陈芸田得知后亲自告诉周里同志，并反映陈明仁个性极强，对各界人士呼吁和平的签名运动颇有反感，建议停止签名，周里同志接受他的建议，使和平起义免另生枝节，陈先生经常向刘寿祺同志提供有关国民党高级官员以及在长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的一些情况和工商界的思想情况等，陈还在工商界筹集银元六万，作为“应变”经费。除支助了起义的姜和赢宪兵团的给养外，还借给地下党一些活动经费，为湖南和平起义提供了经济援助。

在频繁的工作接触中，刘寿祺同志体现了一个历经

风雨的老共产党员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朴实亲切作风。对我影响很深，使我懂得了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很好地团结党外人士，才能做好党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七月，省工委调刘寿祺同志去邵阳工作后，刘禄铨同志来陈公馆与陈先生和我联系，不久便由周里同志的爱人常杏云来与我联系，常大姐对我十分亲切关怀，鼓励我，信任我，常给我些银元作为零花钱和活动费用。有几次常大姐带我到他们家中，为周里同志抄写秘密文件和书信。我记得是用米汤写在毛边纸上，表面看不出字迹，要用水浸泡才显出字迹。内容有些是给准备进城解放军部队负责同志的情况汇报，有的是给程潜等的信件。周里同志的住房十分简陋，家俱很少，我是在一个平矮的四方凳子上抄写信件的。周里同志身体虚弱，几个孩子嗷嗷待哺，但他对全省工作运筹帷幄。在当时情况下，那一方面行动稍省不慎或差错，就会造成损失。所以重大的事请他都要亲自过问，如他多次到陈家与陈芸田先生交谈，尽管陈公馆旁边就有敌特巢穴，但他出生入死、从容不迫，用自己的言行带动和团结了许多上层人物。他本身的榜样力量也深深感染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我那时还不到二十岁，虽有斗争勇气，但还十分幼稚，周里的妻子常大姐就教我一些革命斗争知识和经验。如外出时要用系鞋带等小动作观察是否有

尾巴盯梢。如有跟踪，一定要先设法甩掉尾巴才能去接头地点或回陈公馆。如果被捕，就要十分沉着坚定，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不允许有丧失党的立场和言行，决不能牵连陈芸田先生。万一敌人掌握了自己党员身份的确凿证据，就要以法庭当战场准备牺牲。背叛是可耻的，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

我在陈公馆虽只住了短短三个月，但我在与陈先生的接触中，亲身感到陈光生在敌特密布白色恐怖下，真心诚意地相信党、靠拢党、拥护党，用他当时的特殊地位和身份给地下党提供方便条件，积极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陈先生不愧是与我们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我与他家在何命运共患难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感情，虽经几十年风风雨雨，仍然十分友好，使人倍感珍贵。他的深明大义，坦荡无私的长者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解放前夕我们常唱“跌倒算什么”这首歌，其中有“天快亮，更黑暗”的歌词，正因为是黎明前的黑夜，敌人作垂死挣扎，斗争十分艰险。处在省会城市长沙的地下党，一无政权，二无武装，三无薪饷，敌人则有权有枪有钱并武装到牙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是怎样取得不断胜利的呢？因为人心在我们一边，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在我们这一边，使我们得到有力的支持和掩护，多次逢

凶化吉、化险为夷，我们不仅有广大工农群众为坚强后盾，而且有象陈芸田先生这样的许多忠诚朋友与我们风雨同舟，我们才能分化瓦解一切可以分化的力量，孤立和挫败顽固敌对势力的种种阴谋，迎接黎明的到来。湖南的和平解放，除了靠解放大军仁义之师的威慑力量之外，还靠当对以周里同志为首的湖南地下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正确政策路线和方针。任何时候，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善良人们总是占绝大多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是我们党制订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客观基础。只有最大限度地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较好地完成党的各项工作。我想这个经过历史检验的成功经验，即使在建设时期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喜迎长沙和平解放

丁湘庭

一九四九年初，在地下党河东区委的领导下，长郡中学建立了地下学运小组。由地下党员戴超伦（现省人民出版社社长）担任组长，成员有王正言、黄辛夷、黄润祥、刘成奇、朱正（现省人民出版社总编）等，我当时在组里担任了群运委员兼联络。学运小组先后组织了各种社团，举办工人夜校、民众识字班、工人互助会，进行救灾义演、“五四”巡回演出、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秘密散发传单、教唱革命歌曲、组织参加“争和平、反内战”游行。当时，长郡中学已成为东、南区学运中心，在推翻国民党统治、迎接长沙和平解放的斗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今年纪念长沙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之际，谨记我们迎接黎明的一个片断。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捷报的频传，湖南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当时在湘执政的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毅然接受了中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决心脱

离反动阵营，走和平起义道路。四九年七月下旬，在挫败白崇禧集团破坏长沙城重要设施，阻挠湖南和平解放的企图之后，长沙和平解放的局势已经明朗，人民解放军47军138师进驻春华山，长沙市成立了学生迎接解放联合会，区学联和各校也成立了“迎解委员会。”地下党将迎解的口号、标语、歌曲、宣传提要及注意事项通过各地下支部、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往下布置，迎解工作在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长郡地下小组也积极行动起来，由杨桔荣等五十人组成的腰放队，鼓点整齐，动作划一，颇有气势；大型秧歌队排练的欢快场面仿佛把人带入晴朗的解放区；校康乐股和民歌社的骨干则找来钢板油印机，赶刻、赶印、分发、教唱《东方红》、《百万雄师下江南》、《欢迎解放军》、《庆祝胜利》等歌曲；黄辛夷负责的标语组，除赶写“庆祝湖南和平解放”、“拥护程，陈两将军和平起义”等标语外，还赶制了大批欢通队伍用的各色三角小旗。当时最困难的是必须绘制一幅大幅毛主席像。组长戴长伦千方百计从画报上找到了一张重庆谈判时毛主席与蒋介石的合影。美术教师梁新民先生以此为摹本，花几天时间赶绘了一幅高三米的主席半身炭画像。全校留校学生都投入到紧张的通解工作中，一想到“天快亮了”，大家便忘记了疲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八月四日、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将军发表了《告湖南民

众书》、宣布湖南脱离“广州政府”、驱逐白崇禧集团、和平解放。并号召各革命阶级一致联合起来、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

按市“学迎联”的统一安排，我们慰问了起义的国民党宪兵团，大家敲锣打鼓，送去了一头肥猪和其他慰问品，并与起义官兵一起联欢。之后，城内起义驻军都迁出了长沙城。

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前两天，黄润祥同学担任了入城部队向导，双方确定了入城路线。这时，解放军138师已由东屯渡过浏阳河进入长沙，驻扎在小吴门外衡湘中学。

八月五日九时，按预定方案，人民解放军47军138师正式入城。部队由小吴门进城，经蔡锷路、中山路、黄兴路、南门口、天心阁向司门口送发。二十万长沙居民定出家门，涌向街头，夹道欢迎自己的队伍。整个长沙城沸腾了，到处是欢歌笑语、鞭炮声，腰鼓敲得震天响，秧歌扭得似长龙，长沙进入了狂欢之夜。

我们长郡中学师生排着队伍等候在司门口，第一师范的同学站在对面的街边。路边设立了茶水站，有的用竹竿挂起了万子鞭。欢迎解放军的群众越来越多，四个衡角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一边维持秩序，一边派人打探解放军行进的情况。越着这个间隙，长郡和一师对街拉起了歌子，我们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他们唱《一师出了